

堅持抗戰到底！反對
達安協！堅持統一戰線！
反對挑動內戰！發動全
國戰爭！反對包圍蘇利！
七、四、四、廿五
周世英

救亡日報 的風雨歲月

● 廣西日報新聞研究室 編

救 亡 日 报

的
风
雨
岁
月

● 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 编

435251

G219.577

Rx

435251-1

3112

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

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插页6张 194,000字

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7203·181 定价：1.85元

ISBN 7-5011-0000-4/G·001

序

一九八六年有一天，我在政协大会上遇到林林同志，他要我为《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纪念刊写篇序。他说“去年本已约定胡愈之同志写的，胡愈老也答应了，不幸愈老今年逝世了，除愈老外你是最合适的了。”的确，当《救亡日报》于一九三九年复刊时，我正在广西大学教书。回想当年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啊！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秋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救亡日报》创刊于上海，上海沦陷迁移到广州。广州危急又辗转迁来到桂林。当时桂林是西南的后方，广西省政府及省会所在地。武汉、广州沦陷后，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都麇集在桂林。其中有的是经桂林去重庆的，有的就在桂林住了下来。据我现在所记得，经过桂林去重庆的朋友有郭沫若、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先生，在桂林留下来的就更多了，如李四光、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杨东莼、田汉等等。我是一九三七年抗战发生前便到了桂林的，执教于广西大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二日，蒋介石政府将救国会七位领导人逮捕，即所谓“七君子”之狱（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

里、王造时、李公朴)。我在南京不能立足(我原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遂到广西“政治避难”。当时广西与南京闹对立,桂系当局邀请了一些进步的教授去广西大学教书,其中有陈望道、施存统(即施复亮)、邓初民、熊得山等。我在一九三三年曾经在广西做过经济调查,与桂省当局相识,亦就聘于广西大学,任经济系教授。抗战发生后,桂省当局与蒋介石合作,共同抗日;但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又怕蒋桂合作后被蒋介石吃掉。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李宗仁动身去南京之前一天(十月九日)在桂林成立了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会形式上是一个学术团体,参加的会员叫研究员。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团体,其目的在团结广西地方上中层干部和同情广西的省内外名流学者,作为广西的政治资本。研究会由李宗仁自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会长之下,设有常务委员三人: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李任仁号重毅,是广西政界元老,当过白崇禧的小学老师,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在广西有崇高的政治地位。陈劭先江西人,老同盟会会员,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有年,是国民党真正的左派,与李宗仁有密切关系,在广西处于客卿地位,颇受桂省当局的重视。只有黄同仇是国民党党棍子,时任广西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思想反动,后投靠C·C.,不久到安徽做官去了,研究会实际上负责的是李任仁与陈劭先两位。广西建设研究会实质上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以进步文化人为主,在李重毅与陈劭先两人的主持下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团结、进步的工作。桂林在抗战时期有

“文化城”之称，这是与建设研究会分不开的。

《救亡日报》在广州论陷之后，迁移到桂林出版，这是与当时的广西政治环境分不开的。广西言论比较自由，广西当局为了对抗蒋介石，争取国内名流学者的支持，不得不在表面上伪装进步，所以图书审查制度不象重庆那么顽固不讲理，而且在建设研究会的保护伞下，还可以发表一点有利于共产党团结进步主张的言论，这都是《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有利的条件。

《救亡日报》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复刊的。夏衍率领“救报”的一批干部，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抵达桂林。在夏衍未到桂林之前，我就收到朋友托我转给夏衍的信件。我对夏衍同志虽闻名已久，但在此以前，我们没有见过面，竟有朋友托我转信给夏公，可知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当时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称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早已成立，李克农同志亦早已来到桂林。但李克农是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的。我好几次与克农见面，都在八桂厅（建设研究会会址），因为建研会是在广西公开合法的团体，会长是桂省最高当局，特务们是不敢问津的。

当时在桂林的进步刊物除《救亡日报》外，还有《中国农村》月刊（千家驹主编），《国民公论》（救国会机关报，由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轮流主编），《建设研究》（建设研究会编），《中学生》等等刊物；但这些都是定期刊物，发表大块文章，其影响与作用不能与日报相比拟。当时广西的日报也有好几种，有《广西日报》，这是广西省政府的机关报，

《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这是国民党军委办的。这几份报纸都有它特定的政治背景，与《救亡日报》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广西日报》、《大公报》与《扫荡报》也并非铁板一块；莫乃群同志当过《广西日报》主笔，张锡昌、秦柳方同志也经常为《广西日报》写文章或社论。在抗战后期，我曾经为《大公报》每周写一篇社评；《扫荡报》顾名思义当然是一份最反动的报纸，但《扫荡报》有时也请我们写专论，我就写过不少篇经济专论。但这些报纸，基本上都是代表国民党色彩的。只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名为“大公”，实则起到《中央日报》所不能起的作用。《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后，异军突起，别树一帜，人们知道这是以郭老（沫若）为社长，以夏衍同志为主编的进步报纸，它报道了各地救亡运动以及新华社的消息，并用最巧妙的方式发表出来，它把当天通讯社发布的国内外大事简编为数百到一千字，既有消息又有评论，同时夏衍同志短小精悍的社论也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寿命虽然不长，但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桂林所起的影响是众所公认的。

当然，这样一份在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报纸，反动派是不会允许它长久存在的。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四一年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它们对进步书店、报纸、刊物的压迫变本加厉。各地的生活书店一个一个地被封闭，进步的文化人被逮捕，《救亡日报》也不得不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寿终正寝了。这时夏衍、长江和我都已流亡到香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早已撤销，李克农同志在陈劭先、李任

仁两先生的掩护下，也脱险返回延安。所以它的停刊，是我在香港得到消息的。当时邹韬奋在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周刊，由韬奋任主编，我和夏衍、茅盾、胡绳、金仲华等任编委。《救亡日报》在桂林的被迫停刊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它居然能拖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却出于我们的意外，桂林同人如廖沫沙、林林、张敏思等之苦心支撑，实在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今天离开《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已经有四十九周年了，回想当日的艰苦创业，孤军奋斗，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今日却是红旗插满中国，日寇投降也将近半个世纪，这令我们非常兴奋；但当日在同一条战线奋战的同志，如范长江、胡愈之、杨东莼、陈劭先等都已先后离开了人世，却又不禁感慨系之了。所幸夏衍、林林、廖沫沙以及张敏思、华嘉、高汾、吴颂平同志仍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祝他们健康长寿，自强不息！是为序。

千家驹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四日

目 录

序.....	千家驹(1)
记《救亡日报》.....	夏 衍(1)
《救亡日报》在上海.....	彭启一(49)
共有的信念.....	郁 风(58)
——忆广州《救亡日报》	
记桂林《救亡日报》.....	林 林(62)
在桂林《救亡日报》的时候.....	张敏思(尔华)(79)
我们姐妹俩.....	高 汾(90)
——怀念我的姐姐高颢	
桂林《救亡日报》的小副刊《十字街》.....	华 嘉(106)
我在《救亡日报》.....	戈 今(113)
漫忆南方出版社.....	王仿子(健行)(120)
在《救亡日报》锻炼成长.....	丁 明(何家英)(126)
《救亡日报》——哺育我成长的母亲.....	公 盾(133)
一个小兵的回忆片断.....	冯 焯(暉)(143)

- 《救亡日报》印刷厂杂忆……………刘和坤(146)
- 夏衍和《救亡日报》……………高 汾(150)
- 忆廖沫沙两进《救亡日报》……………吴砥循(155)
- 回忆断片……………胡愈之(164)
- 《救亡日报》两岁志喜……………田 汉(168)
- 一年来……………陈紫秋(171)
- 为本报移桂复刊周年纪念写
- 昨天和今天……………高 灏(173)
- 我所认识的《救亡日报》……………司马文森(176)
- 《救亡日报》的卓越领导者——夏衍……………高 宁(178)
- 中越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黄 铮(195)
- 胡志明为桂林《救亡日报》撰文纪实
- 风格独特的《救亡日报》……………沙 夏(204)
- “救报”老报人忆旧杂谈
- 忆“救报”谈改革……………赵 宁(213)
- 访问“救报”老报人夏衍、廖沫沙、林林等
- 《救亡日报》大事记……………吴颂平(执笔)赵 宁(222)

记《救亡日报》

夏 衍

一、上海创刊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到重庆进了《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出了不久，都被国民党封闭；接着我去新加坡，参加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在那里干了半年，被当地政府“礼送出境”，重返香港，又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奉调离开香港。这十二年的记者生涯，说来是十分坎坷的，其中《救亡日报》被国民党禁止出版，前后共两次；因为所在地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而发生的停刊事件也有两次。但是尽管环境艰难，国民党的文网严密，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现在，先谈一点

《救亡日报》的情况。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文教”）的机关报，每天出四开一张。这张报最初是打算由“上海文教”独立举办的。但是在筹备期间，发生了——也可以说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这年七月下旬郭沫若同志从日本回到了上海，“文教”也成为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团体，因此，这张报也就有了国民党人士参加。这中间的经过，现在只有很少人知道了。因为在郭沫若回到上海之前，也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宣布国共合作的消息之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虽然不敢对声势浩大的“上海文教”公开迫害，但是一直采取敌对态度，不予合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上海文教”在南市开会欢迎郭沫若归国的时候，上海市国民党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还纠集了一些流氓特务来进行捣乱。但不久周恩来同志在庐山和蒋介石谈定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案，继而在上海又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方面，最初是以潘公展为首，反对“上海文教”出机关报，这时候才被迫改变态度，企图挤进“上海文教”，对这张报纸插上一手。记得在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约我到郭沫若的寓所去谈话，去了之后，才知道郭、潘两人已经约好到浦东大楼（“上海文教”所在地）和潘公展谈判合作办《救亡日报》的事情。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决定要我协助郭沫若办这一张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我们三人到了浦东大楼潘公展的办公室，寒暄了几句之后，潘公展主

动提出说，现在沫若先生回来了，那么这张报纸就请郭先生当社长。表面看来他似乎很慷慨，事实上这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也是“上海文救”主要负责人和群众所公推的，潘公展自己也知道无法抗拒，因此乐得表示一下慷慨。他接着说，既然是双方合作来办，那么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郭沫若表示同意，并立即根据我党的决定，提出我方由夏衍任总编辑。潘公展看来也已经有了准备，说他想请暨南大学教授樊仲云任总编辑，接着他又提了要汪馥泉任编辑部主任，由周寒梅任经理，此外还派了一个叫张镛的当了干事。当时郭沫若和潘汉年对其他人事没有预先商定，因此说，我方的编辑主任、副经理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都由社长来决定。至于经费，因为国民党方面估计这张报纸办不长，所以平常装得气派很大的潘公展，这时候吞吞吐吐地讲，他们先出五百元办起来再说。接着潘汉年表示，那么我们也出五百元。这就是国共合作办《救亡日报》的第一次商谈。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开始，包括潘公展之流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官吏，还摸不透蒋介石对于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所以当天尽管相互戒备，但是潘公展的态度显然有了一点变化。他在不久之前还派上海滑稽演员刘春山等一批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的大会，他本人对郭沫若连招呼都不打，可是这一次却似乎很客气了。最后他还说：就这样谈定了，以后如有经济、发行等困难，我们再谈；报社的事情，例如要哪些人当记者，哪些人管发行，都请郭先生决定，没有太大的事情，我就不参加讨论了。这样，除国民党派定的

樊仲云等人之外，其余的编辑、记者以及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由郭沫若和我和“上海文救”宣传部协同决定。当时决定以钱杏邨（表面上由林林出面）对付汪馥泉，担任实际的编辑主任；专业记者只有周钢鸣、彭启一和叶文津三人。其他则由“上海文救”的成员自动供稿。初办时，每天到社办公的，除上述几个人之外，还有姚潜修、郁风等人。特别要提出的是，胡愈之、郑振铎也以“文救”宣传委员的身份，也几乎每天来社参加工作。我们同意潘公展推荐的樊仲云、汪馥泉、周寒梅等人，也还有一些具体原因：樊仲云我过去认识，他和我的朋友吴觉农很熟，同时他不是潘公展的嫡系，也不是有经验的反共分子；至于汪馥泉，那是我中学同学，五四运动时，他也参加过《浙江新潮》的工作，他还在国共第一次分裂以后，在上海帮陈望道先生办过大江书铺，也替中间的一些杂志写过文章，这个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见解。因此，潘公展派这些人来参加《救亡日报》的工作，他也明白自己这边在版面和文字方面处于劣势，因此他就想通过亲信周寒梅、张镛从经济上、发行上做手脚，使这张报纸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大家知道，当时上海有十多家大报，几十张小报，在这种情况下，出一张既无广告，又无小市民喜欢的猎奇新闻的报纸，要存在下去很不容易。因此，我们的作法是：一方面与潘公展合作，利用他的名义争取公开合法；一方面控制编辑大权，不让他们插手。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潘公展除了用周寒梅在发行、印刷方面捣些乱之外，在编辑、言论方面没有起任何作用。

这份报纸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创刊。当时全社不过十来个人，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写稿不取稿费，甚至于到报社办公的交通费也自己负担。我们的依靠，是当时参加“上海文救”的绝大部分进步文化工作者。所有当时在上海的知名进步人士，首先是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等等，此外，还有文学界、戏剧界、社会科学界、电影界的各方面人士，都替我们写稿，甚至自愿替我们奔走采访消息，有的还替我们跟报贩打交道，劝说他们帮助这份在上海很难打开局面的正派报纸。

当时正是沪战最激烈的时刻，在前线的几个国民党将领都是郭沫若在武汉北伐时期的相知。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首先派人来访问郭社长，表示支持《救亡日报》，并订了二百份《救亡日报》到前线去散发，同时还似乎很诚恳地请郭社长替他组织三个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担任宣传慰劳和救济难民的工作。当时经组织上同意，郭沫若答应了他的要求，组织了以杜国庠等三人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每团二、三十人，成员完全由郭沫若决定。有一个团本来由我担任团长，但后来沪战告急，郭沫若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决定在上海沦陷后把《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去出版，继续由我负责，因此让左洪涛代替我担任了团长。在这个时期，田汉也从南京到了上海，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一到上海，就几乎每天带着他所熟悉的人慰问伤兵，救济难民，还同郭沫若和我不止一次到张发奎、罗卓英的司令部去劳军。他是一位酒豪，又是才思敏捷的诗人，一到这些司令部，酒罢纵谈之余，当场挥毫赋诗，

来慰劳前线将士。回到上海，他还到大陆商场《救亡日报》的编辑部来写文章，写当天的报道。有一次国民党空军来轰炸停泊在黄浦江对面的日本“出云舰”，正值田汉在大陆商场我们编辑部。目击此举，他立即提笔写了一篇关于日本海军，特别是关于“出云舰”的详尽报道，得到了读者的很大好评。

国民党派到《救亡日报》的樊仲云几乎是不负责任的，只在出版后几天，每晚八九点钟到大陆商场的编辑部来走一走，就算完成了他的任务。很显然，他对抗战没有信心。汪馥泉倒是每天来办公，他要求供应他来回的车费，要求给他点香烟和茶叶等等，我们都破例满足了他的要求。至于周寒梅，那是个进行破坏的幕后人物。他每天早晨到报社一次，向报贩收报费，然后对我说，今天销了多少份，卖了多少钱，这样办下去，一千块钱肯定会很快赔完的等等，借此来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并不气馁，只是在出版了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周寒梅的破坏，担任出版、印刷、排字的工厂要求增加印刷费，为了换印刷所，停刊了七天，以后又继续出版。当时上海已经很危急了，日本军队包围了市区，直迫南市，我们的记者进出都很困难。这时候出于意料之外，也可以说是出于意料之中吧，两党筹措的一千元已经告罄。但由于得到了何香凝先生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我们没有再向潘公展要钱，而报纸仍然出版下去，这就使周寒梅对报纸失去了控制权，他要想继续担任向报贩收钱、向印刷所交钱的职务，就非得向潘公展要钱不可，而这是他办不到的。一九三七年九、十月，尽管被上海的外文报纸说成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

但是这种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除了前面讲过的经济问题以外，由于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下面又写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因此出版之后，不到两天，樊仲云就通过汪馥泉问我，是否应按“协议”在总编辑名字后面，再加上樊仲云的名字，这遭到了我的拒绝。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而且，汪馥泉也不敢公开把这件事情向郭社长提出，因此我们置之不理，他也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樊仲云再也不到《救亡日报》来了。

在上海，《救亡日报》形式上和一般小报相同，但内容上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而是专靠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及文艺作品为内容的报纸，要在上海这个地方站住脚，困难确实很多。上海的报贩组织是相当厉害的，它不卖你的报，它不替你发报，你就无法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最初，那个报贩头子对我们《救亡日报》是毫无兴趣的。我和汪馥泉第一次同他（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谈判，他简直不相信这张报纸能出一个星期；关于销数，他说能销到五百份已经很费劲了。但是，出乎报贩头子的意料，这张报纸一出版，由于坚持团结抗日的旗帜和方向，有精辟的战局分析和实际的战地采访，不讲假话，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而且把日本占领上海后可能发生的祸害告诉大家，希望人民群众有一定的精神准备，因此，《救亡日报》尽管处境困难，每天仍能销到一千份以上，最多的时候能销到三千五百多份。《救亡日报》是在上海激战之际开办的，因此，“上海文教”的